

收稿日期:2021-03-21

《孙子兵法》英语译介中军事思想的多元阐释

汪春成

(铜陵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从解释学视角看,由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文本疏离感及远化,以及译介者从自身文化视角对源文的多元“文化视野”解读,因此译介者会把独特的文化编码融入到翻译当中。在《孙子兵法》的翻译过程中,军人出身的塞缪尔·格里菲斯、汉学研究者约翰·闵福德、丹玛翻译小组等多个英语译介者,在专业领域、翻译目的、文化理解等因素影响下,对其军事思想作出了多元化阐释。《孙子兵法》英语译介的多元阐释,推动了军事思想跨文化、跨领域的传播,也推动了中国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交融。

关键词:《孙子兵法》;译介学;解释学;军事思想;多元阐释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3-0054-0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译介学视域下安徽当代文学精品‘走出去’研究”(SK2019A0588)。

作者简介:汪春成(1976—),男,安徽舒城人,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3.036

《孙子兵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兵学典籍,这部兵法的军事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在当下仍具有指导意义。《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暗示军事斗争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延续。然而当今世界,同样需要译介《孙子兵法》以准确了解军事斗争的真谛,以消除单纯为战争而战争、为杀戮而杀戮的极端思想^[1]。冯友兰曾指出:“《孙子兵法》军事思想不仅用来指导战争,它还深入到政治外交、社会经济、企业经营管理、竞技比赛等社会科学方面。”^[2]《新闻周刊》甚至评价道:“读了这本书后,就可以把现代那些管理和领导力的书扔掉了。”^[3]

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奥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开创了《孙子兵法》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先河。1905年,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率先出版了《孙子兵法》的英译本,但此时英语国家读者并未对这部东方古老军事典籍产生太多兴趣。直到朝鲜战争时,实行陆军、海军、空军联合作战的美军,被肩扛钢枪、手捧炒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晕头转向。这场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战争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让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开始重视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及《孙子兵法》的研究。1963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斯逐字逐句地译

介绍了《孙子兵法》，定名为《孙子的战争艺术》，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该书做序^[4]。

格里菲斯的译本一经出版便得到极高赞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代表作丛书》，从此《孙子兵法》的英文翻译逐渐走向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至2007年，《孙子兵法》英语译介版本达到28种，其中美国学者译介本就有18种。

一、译介多元阐释产生的原因

(一) 频繁译介迫使译者必须另辟蹊径地阐释源文本

许钧认为：“译介是有前人译本后，再有译者复出译本的一种翻译活动。”^[5]价值越高、影响力越大的作品被译介的可能性越大，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这些中国古典名著思想极强，解读空间较大，每一次的译介都能带来新的阐释，因此译介者众多。不过尤金·奈达还认为：“因历史跨度、文化发展与语言的变化，无论这部作品翻译得如何完美，如何贴近原作，都不会永久保持它的活力。”^[6]这些名著会被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者译介，甚至在同一时期被多个译者译成数个不同的译介本。所以当这些译者们以独特的个性与不同文化视角来阐释各自译介本时，也大大弥补了单一译本的局限性与不足。

可是《孙子兵法》的译介本众多，每个译者都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挑战源文本的思想高度，另一方面还要面临前译者的巨大压力。译介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能迫使译者提高翻译产品质量，丰富完善翻译风格，创新理解文化与思想内涵^[7]。而每个译者也都希望自己的译本是无二一的，他们必须以独树一帜的视角来阐释自己的译介，并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符合时代的语言来准确翻译表述，从而确立自己译介本的地位。

(二) 译介目的的不同促使阐释视角更为多元化

以解释学视角看文本翻译及其阐释，同一性与多元性既对立统一又相辅相成，翻译的本身就是求同存异的过程。孙际惠认为：“由于文本的疏离感及远化，以及译介者的创造性翻译，文本就开始呈现出多元阐释形态了。但对文本本身的多元阐释也不是无穷尽的，他还有同一性。”^[8]尤其像《孙子兵法》这样的东方典籍，其远化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20世纪以来，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既是读者，又是译介者。他们以异域文化视角、不同的翻译目的、现代的眼光译介《孙子兵法》时，译文的意义和表达方式就会出现巨大差别。另外，当译介者面对远化的历史文化语境时，会对源文本意义投入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解与阐述，以补充文本意义留下的文化空白。伽达默尔也认为，译者通过与文本的对话，以创造性翻译将作者的“初始视野”与读者的“历史视野”相融合成“视野融合”，便能消弭先前理解的限制，获得崭新的认知。

笔者选择的美国塞缪尔·格里菲斯、英国汉学家约翰·闵福德、美国丹玛翻译小组(简称“丹玛”)等人翻译具有代表性的英语译介本进行对比。塞缪尔·格里菲是职业军人，他译介《孙子兵法》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美国军队自身军事思想的局限性。他全面研读了《道德经》《战国史》等古代典籍与史料文献，认真了解了《孙子兵法》成书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对比研究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关系。同时，他还重视中国古代战例战史研究，在注解中翻译引用战例战史28条，另外引用包括曹操在内的中国古代军事名家注解209条^[9]。塞缪尔·格里菲斯还侧重军事术语、军队编制与武器的研究及翻译，大量使用现代军事学术语进行翻译，如《地形篇》中“兵无选锋，曰北”被翻译成：

Or when he fails to select shock troops for the van, the result is rout.^[10]

其中 shock troop(突击部队)与 van(先头部队)即为现代军事术语。

英国汉学家约翰·闵福德对中国传统文化钻研颇深,汉语功底深厚。他先后翻译了《易经》《道德经》《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2002年出版的《孙子兵法》译介本,语言十分简明精粹,论述较为全面,展示了他深厚的中华文化学术底蕴。

丹玛推出了对《孙子兵法》历时10年的翻译研究。与其他西方译者采取归化翻译策略不同,丹玛的译本采取了难度很高的异化翻译策略,这使得译文与原文十分相近,词句极为精炼简明,而且汉译英之间似乎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应,翻译尤其严谨。同时译本的文体与修辞颇具韵律感,这是译者希望英语国家读者能体会到原文的优美,找到阅读的快乐。另外丹玛还在译文之外增加了大量的注释解释、阐释归纳、总结评述,主要是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哲学内涵进行多元阐述^[11]。

二、译介多元阐释及其变异的内容

(一)对战争性质的多元阐述与变异

战争是指几方以政治、经济为目的进行的武装斗争,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孟子·尽心下》中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以“春秋大义”的儒家角度诠释那段纷乱的历史时,准确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样态。塞缪尔·格里菲斯在《导言·战国时代》中这样描写:

这个“天下大乱(All-under-Heaven was in chaos)的时期”,充满了奸伪与险诈,到处都有奸细与卧底。只要有人花钱,那些狼子野心的将军们随时都会背叛原来的国家,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0]

塞缪尔·格里菲斯对战国名将吴起“杀妻求将”也颇有微词,并认为其道德水平代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人物的水平。

塞缪尔·格里菲斯还提到了墨子阐述的战争正义性。他全面译介了《墨子·非攻》的原文,并指出,墨子认为战争本质就是摧毁与破坏,是产生罪恶与苦难的最重要根源。然而塞缪尔·格里菲斯虽然赞同墨子的“兼爱非攻”,却不认同其战争观点的实践性。他认为,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不可能被那个时代的封建主接受的,因为在强大的权欲面前,这种道德批判的声音很快会被选择性地过滤掉了^[12]。所以塞缪尔·格里菲斯翻译《孙子·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时阐释:

孙子清楚,战争不是双方士兵之间的殊死决斗,战争道义、将士们的智力、环境因素及地形比士兵数量更关键。^[10]

而这段话的原意是:战争,是国家头等大事,(一旦开始)将进入生与死(这样极端转环)的绝境,(涉及)生存与灭亡的重大决策,不得不认真谨慎地考察、研究。虽然塞缪尔·格里菲斯对中国古文的了解不如闵福德,对“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之语的认识略显不足,但他从现代军事学角度较为准确地阐释了孙子这段话。另外塞缪尔·格里菲斯在阐述七计中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时还认为:“要满足这一条件,政府必须照顾到人民生存利益。”^[12]因此他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是确立在“仁慈和正义(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的根基上”。原文大意为:(要发动一场战争)君主与民众必须保持目标一致,上下一心。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所以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塞缪尔·格里菲斯以现代战争观阐释两千多年前中国兵家思想观,略显不妥。不过他的战争观却十分符合当今时代的军事

进步思潮。

丹玛也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注重“民心向背”，既有墨家民本意识，也有儒家的仁义。因此在战争性质的问题上，虽然这些译介者阐释的角度不同，但综合来看，他们都在强调战争的正义性^[13]。

(二)对战争德性与素养的多元阐释与变异

约翰·闵福德在译介中阐述道，对统帅的德性要求是指“智(wisdom)、信(integrity)、仁(compassion)、勇(courage)、严(severity)”。塞缪尔·格里菲斯则认为这五种美德与儒家“仁、义、礼、智、信”是同源的。约翰·闵福德对此举例阐释道：“裘力斯·凯撒创建相互尊重、彼此互信、沟通顺畅的军纪，因此深得士兵的拥护，并将自己的统帅当作战友，共同杀敌。这个上下一心的军队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14]塞缪尔·格里菲斯也确认：上下同心、团结一致是取胜的重要前提。他在《导言·孙子与毛泽东》中专门对蒋介石与毛泽东分别领导的部队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对比描述：

蒋介石及其军阀军队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严重。部队内部派系林立，贪污腐败，相互扯皮。相比之下，毛泽东与朱德却打造官兵平等的军队，他们从来不体罚士兵，他们廉洁自律。他们以正义的思想引导自发加入军队的农民，建成一支忠诚无畏、雷厉风行、英勇善战的军队。^[10]

塞缪尔·格里菲斯与约翰·闵福德从儒家视角来阐释《孙子兵法》，并不能全面理解《孙子兵法》中“五德”的真正含义。丹玛认为“仁爱”德行必须与严明军纪相结合，才能产生“信”，以形成上下一心、令行禁止、赤诚相待的军队。当然，仁爱、廉洁与忠诚这些美好德行不能走向极端，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另外，《孙子兵法》中的“智”包含“诡道”，而约翰·闵福德一直将“诡道”解释为“诡计”，抨击这是“见利忘义的道德伦理问题”。所以在“仁爱”与“兵者，诡道也”的辩证关系上，约翰·闵福德还以儒家观点阐释：《孙子兵法》强调强有力进攻自然会赢得胜利，可毕竟过于残暴，以“仁义”方式取胜才是最佳战争策略。如果能用计谋取胜，就不应采取武力的方式。约翰·闵福德对贾尔斯阐释的“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也产生质疑，认为“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和平，只是中国人惯有的思维观念。虽然这个评价新颖有趣，但战争与和平没有关联性，也未必正确”^[15]。约翰·闵福德以偏概全的阐释及其变异，是其“东方主义”价值体系的体现。然而在矛盾无法调和的军事斗争面前，如果“仁爱”能起作用的话，就不会有海湾战争与叙利亚战争、阿富汗战争及其他大大小小的战争。

丹玛则从现代政治角度阐释“诡道”与“仁爱”的关系。实际上，“诡道”与“仁爱”是军事斗争的两条腿，是辩证统一的军事哲学思想，“诡道”的目的是“仁爱”，“仁爱”也需要“诡道”来辅助，两者不是绝对的。丹玛以现代辩证思维阐释它们，较为符合《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三)对战争之“道”的多元阐述与异化

1. 对“全胜”之道的多元阐述与异化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原意为“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部敌人，才是高明中的高明”。而老子认为，常法与正道是治国之道，出奇制胜是用兵之道，体恤民情，顺从民意的德行是平定天下之道。约翰·闵福德认为《孙子兵法》的“全胜”是以老子的

“道”为根基。其在注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时用《道德经》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来阐释：

武力征伐仅仅是战争的一种形式，却不是战争手段中最佳的选项，战争宗旨是让敌手屈服，最终目的是改变对方立场与令其驯服。^[16]

约翰·闵福德阐释虽然符合老子的“无为”主张，但他没能全面理解《孙子兵法》“全胜”的概念，只是单纯强调以政治来解决军事斗争，以仁德来化解战争的仇怨。而且约翰·闵福德在《孙子兵法》译介中，时而会穿凿附会地引用老子论点。他甚至认为《素女经》及采补术也是道家的思想，并以此引证来论述《孙子兵法》。约翰·闵福德认为《孙子兵法》也适用于“两性之间的战场(sexual battlefield)”及“性生活技巧”。但其实在道家看来，采补术是伤天害理的旁门左道。

丹玛从全局和局部的哲学辩证观点来理解“全胜”概念，其思想高度已超过了《孙子兵法》，丹玛阐释道：

“全胜”的制胜策略能保证国家的完整，强调谋取全局的综合性胜利，而不是简单地以武力征服。对比“百胜”，“全胜”的战争只聚焦在关键节点，其战争也不会引发“百胜”那样连锁式的武力冲突。而这一军事哲学还适用社会活动其他事物。“全胜”不是反对使用武力，恰恰相反，它正是在谋求战争胜利的条件下审视战争，强调以一点带动全局。^[17]

2. 对“无形”之道的多元阐述与异化

约翰·闵福德对《虚实篇》中“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阐释道：

《孙子兵法》中的“形(form)”，其哲学观点极为巧妙，它与道家的“无为(nonaction wuwei)”极为相似。《道德经》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而《孙子兵法》认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16]

实际上《孙子兵法》虚实篇中提到的“形”，是指作战部队在调动部署时的“有形与无形”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军形篇所说要保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战略态势。两个“形”之间有细微差别，这种阐释的异化是因为约翰·闵福德太关注《孙子兵法》“军形”的军事思想内涵，却忽略了“行兵”的实战指导意义。

约翰·闵福德还认为，“道(Tao)”本自然，因此战争双方的胜负是具有客观规律的，是建立在战争之道基础上的。他在阐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时，引用了老子的“譬道在天下，犹川谷与江海”来注释。约翰·闵福德这段注释可谓点睛之笔，他认为战争“无形”的胜利，始于为人民而战的正义之师。另外他还引用《淮南子·兵略录》中“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来强化这段阐述。虽然约翰·闵福德曲解了“兵形”的“有形与无形”，但却无心插柳般，精准阐释了《孙子兵法》中“道”的精髓。

约翰·闵福德阐述“无形”与“无为”的关系时，认为“无形”就是隐藏作战意图，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另外约翰·闵福德还认为：一个统帅获得战争胜利却没有实施狡诈的计策，没有进行勇猛无畏的冲锋，这全部归功于他的运筹帷幄。他特意引用《道德经》中“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段话来印证这“无形”与“无为”的关系。实际上在世界战争史范围内，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却取胜的战争案例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约翰·闵福德对《孙子兵法》阐释的异化，与其形而上的、道家与儒家融合的战争观有直接关系。

相对来说，丹玛阐释得较为客观。其在翻译《军争篇》中的“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

次用兵之法也”时也阐述“无形”与“无为”的关系,他借用《诗经·大雅·文王》的诗歌来阐述:

这首赞颂周文王的诗歌中说,如果部署得无形无息,敌人就没办法发现你的进攻意图。若是军事行动与自然的节奏协行,更会占据主动。^[17]

丹玛认为,战争只是为了取得胜利,而不是赶尽杀绝。一味地随意使用暴力进行征伐侵略,不仅不得民心,反而会遭到反噬,因此“无形”之胜的精髓在于“无为”。武力征服只是手段,政治的征服才是根本。显然,丹玛以现代社会的军事思想阐释的“无形”更为精彩。

3. 对战争“形势”的多元阐释与异化

在《孙子兵法》中关于“形”与“势”的解释是,“胜者之战人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形也;激水之急,至于飘石者,势也”。如果“形”是指战争外在的、运动的物质形态;那么“势”就是让这些运动的物质形态更高效而精准地运转,以产生巨大的内在能量。对此约翰·闵福德认为,“形”与“势”已渗透到中国人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既包括军事斗争与政治博弈,包括经商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甚至包括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形势”已成为中国人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哲学文化观念了。约翰·闵福德在阐释《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时还认为,“有形”则表明陷入僵化,“无形”则意味着更加灵活机动。当我们成功地“示形诱敌”时,则会让敌方战场思维的变化与行动陷入僵化与停滞,而我们保持了灵活主动。另外约翰·闵福德阐释“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时还引申阐释道:“势”在竞争中往往会产生决定性作用。竞争的策略安排必须针对客观情况采取相应“势”的变化,因此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僵化固守意味着逐渐丧失主动权。要让对方迷失方向,丧失主动权,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形势”变化来获取竞争优势。

约翰·闵福德以当代社会科学军事思想来解释“形”与“势”的关系,虽然较为抽象,但阐释视角严谨,内容全面,也将《孙子兵法》从军事方面延伸向其他社会活动方面。比较来看,丹玛对“形势”阐释更具体,其在《孙子兵法·军形篇》阐释中先从防守的角度来解释:

若我方行动能让敌方不知不觉,对手就不能察觉我方的部署与企图。若我方军事行动能与自然协行,那么还将获得更大的优势。至于如何获胜在《孙子兵法》的其他章节已给出了答案,这里重申的是,我们的“形”的筹划应对的是“不可胜”。所以我们不应将策略确立在对方可能的军事行动上,而是确立在自己的绸缪当中,最好全面摆脱对手的策略掌控,这样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17]

丹玛又在阐述《孙子兵法·始计篇》及“计利以听,乃为势”时,从进攻的角度阐释道:

虽然通过“计算”,可以找到致胜的优势,但最终的胜利需要运用战争的手段来完成。虽然通过“计算”得知我们会胜利,但如何胜利?需要统帅敏锐地掌握战场上稍纵即逝的“势”的变化。而“计算”,就是找到撬动“势”的那个支点。^[17]

丹玛还对“势”做了其他阐释,如阐释“任势”时就认为,统帅不应为了“形”而“形”,把过多时间与精力消耗在军事部署上。一旦发现有利战机,就应果决发动进攻,“速胜”才是战争根本。另外“形”要根据“势”来调整。丹玛的阐释增强了《孙子兵法》原有内容的系统性,使其具有了现代军事斗争的实践性与指导意义。

4. 对对立统一辩证观点的多元阐述与变异

一个事物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由此产生了运动与生命力。包括《易经》、道家和《孙子兵

法》等典籍或学派,都阐述过这种朴素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就包括“众寡”“虚实”“劳逸”“强弱”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矛盾要素。约翰·闵福德引用西方哲学“二元论”来阐释:这些矛盾要素作为循环二分法(recurring dichotomy),有着深刻的道家思想内涵。他阐述《孙子兵法·军争篇》时还认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与《道德经》中的‘曲则全,弯则直’的含义完全相同,都是为了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需要采取迂回战术,化不利为有利,来获得最佳战机。”^[18]

约翰·闵福德引用“二元论”与道家思想来阐释《孙子兵法》的辩证观。与之不同的是,丹玛则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想延伸到其他社会领域。他在阐述《孙子兵法·势篇》的“奇正”时论述道:

“正(orthodox)”是按照大多数人认为科学正确的方法来统筹解决面临的竞争问题,所以“正”是大多数人习惯性的认知、一般意义上的正确概念。相对来说“奇(extraordinary)”却是超乎寻常的、超出正常人们认知习惯的正确概念。战争中“正”指中规中矩地进行战略部署与战术行动,而“奇”就是采取超出人的常规认知概念,预见方向、思维模式的行动。换言之,所谓“奇”就是采取敌人想不到的行动。^[17]

比较起来,丹玛的阐释超出了《孙子兵法》涵义范围,其思想延展性更强。丹玛认为《孙子兵法》的哲学体系不仅体现在战争方面,还可以引申到企业竞争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

三、译介多元阐释的意义

(一)译介多元阐释推动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跨文化、跨领域传播

20世纪以来,《孙子兵法》新的译介传播进入高潮。《孙子兵法》在全球的拥趸不仅有军事家,还有企业家、哲学家等,其思想在多个社会领域特别是商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段时期译介的目的更趋多元,更多是探索《孙子兵法》的哲学内涵、理论的实用性及其指导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华商还是本土商人都在尝试运用《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内核,以独特的专业视角来阐述它。如法国的《欧洲时报》推出了“法国巴黎商学院开设孙子兵法课”“法国时装界卡芬女士运用孙子兵法取得成功”等有关《孙子兵法》的应用典型。日本村山孚还指出,日本现代企业的两个支柱分别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与《孙子兵法》的战略策略。日本企业家们很早就将《孙子兵法》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企业发展与竞争当中。而美国商界精英也将《孙子兵法》当作学习典范,马克·麦克尼尔利的《孙子与商业艺术:经理们的六项战略法则》,通过跨文化的、跨行业领域的多元阐述,将《孙子兵法》13篇浓缩成英语读者容易理解的6项战略,通俗易懂地解读这部来自东方古老的经典。这本书最终也被翻译成5种语言,6次再版^[19]。

另外,在美国劳伦斯·布拉姆的《中国经营的窍门在于(孙子)》、斯坦利·宾所的《孙子叹为观止的胜利术》中,这些译介者没有过多纠结《孙子兵法》的原文引用,过多纠缠原文的注释与解释,而是按照各自的文化理解,对该书的军事哲学精髓进行阐释,以喜闻乐见的文化阐述让使英语国家读者接受。王秉沁认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一定在世界科学这个庞大纷杂的体系内,从其他学科尤其新兴学科吸收养分,拓展视野与思路。”^[20]20世纪以来,对《孙子兵法》的跨文化、跨领域、跨语言译介更为迅猛,多元文化阐述视角更为宽泛。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各行各业的译介者们,以独有文化符码解读来自东方古老汉语的内涵,探究其军事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孙子兵法》流传至今,已成为中华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文化遗传。

(二)译介多元阐释推动了中国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交融

在《孙子兵法》译介中,译者精准还原源文本所有含义,准确传递源文本文化信息是十分重要

的。根据协同理论,东方古老思想分享到美国及英语国家时,由于历史时代、地域、民族的文化底色、发展路径与社会体系的不同,源文与译文之间、译介者与读者之间都会出现无法消除的巨大文化差异。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迁变,新的文化声音又开始出现。对“自组织性翻译系统”的《孙子兵法》英译系统来说,20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下军人出身的塞缪尔·格里菲斯,汉学研究者约翰·闵福德、21世纪丹玛翻译小组等,因翻译目的、文化理解,价值观、专业领域的不同、对《孙子兵法》内在的军事哲学思想的阐释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另外根据乔治·巴尼特与劳伦斯·金启德的文化聚合理论,两种或两种以上群体的文化信息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孙子兵法》及其军事哲学思想在长时间的跨文化传播中,全部译介者在这个封闭系统里,持续地向愈加平均的集体思维模式聚合,并在时间的消释下,两个天壤之别的文化群体产生的文化信息也开始愈发接近了。因此在协同理论与文化聚合理论的双重作用下,《孙子兵法》及其军事哲学思想在英语国家的译介传播中,既有融合理解,又存在着天然文化藩篱^[21]。

“和而不同”的跨文化传播,既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独立性,防止文化趋同而产生文化同质化,也更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激荡,激发世界文化整体思想创新,并在不同文化群体对话当中,相互摒弃文化糟粕,发扬文化优势。另外,它还能保持文化丰富性、文化阐释的多元视角。因此,综观《孙子兵法》的英语译介及其多元阐释,不同时代的译介者们不断译介其中的思想内涵,同时激发出新的文化认知,继而延展其文化涵义,甚至以全新视角编译其暗含的文化意旨。在这种“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的跨文化传播中,译介者与译本、源文本不断对话、领悟、阐释。而这些纷繁多样的阐释、总结、评述也直接推动了《孙子兵法》在英语国家的跨文化传播,这有利于英语读者更好领会来自东方的古老典籍的哲学思想,激发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互信。

参考文献

- [1] 黄姗,何姗.《孙子兵法》的两个英译本比较: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角度[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113-115.
- [2] 吴如嵩.《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N].光明日报,2007-03-22(10).
- [3] 梁隽.中国世界杯之旅台前幕后[J].新闻周刊,2002(15):74-75.
- [4] 程虎.《孙子兵法》英译本及其文本外影响因素对比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1(2):42-43.
- [5] 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当代外语研究,2017(3):1-5.
- [6] 熊德米.奈达翻译理论评述[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85-89.
- [7] 陈惠惠.论文化差异对《孙子兵法》两个不同英译本的影响[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12):211-212.
- [8] 黄海翔.如何尊重差异:文化翻译整体观视角下《孙子兵法·九地篇》两译本评析[J].海外英语,2010(10):161-163.
- [9] 孙际惠.文本阐释的多元与同一[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5):109-112.
- [10] SUN T. The Art of War[M]. SAMUEL G,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 [11] 谢道挺.《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主体性蠡测:以翟林奈、闵福德二译本为中心[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19-122.
- [12] 张露.中西正义战争思想比较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5(4):15-20.
- [13] 唐璐,董晓波.《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译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9-26(8).
- [14] 周英.“视域融合”概念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闵福德译《孙子兵法》个案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09.
- [15] 黄海翔.高低文化语境下典籍英译的语境重构与文化误读:以《孙子兵法·九地篇》Mair英译本的语境重构方式为例[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9-69.

- [16] SUN W. *The Art of War*[M]. MINFORD J, Trans. Viking Penguin, 2002.
- [17] SUN W. *The Art of War*[M].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Trans.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2.
- [18] 郑建宁.《孙子兵法》译史钩沉[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78-188.
- [19] 王铭.20世纪《孙子兵法》英译本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5.
- [20] 马卫华.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翻译过程的本质[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114-116.
- [21] 商海燕.美国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翻译与研究[J].滨州学院学报,2007(5):101-104.

On Multiple-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Sun Tzu's *The Art of War*

WANG Chun-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Anhui, 24406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n Tzu's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reveals that due to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remoteness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s well as the multiple-"cultural horizo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urce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own culture, the translators' unique cultural cod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translation.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translations by military officer Samuel Griffith, Sinologist John Minford,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and other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book is diversified due to different professional fields, translation purposes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e multiple-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has promoted the cross-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ransmission of the military thought,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Key words: *The Art of War*; Medio-translatology; hermeneutics; military thought; multiple-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王建霞〕